

【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演变历程及特点

余子侠 王海凤

【摘要】在近代中国,先后有二十余国的学子来华留学。这些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留学方式、所选学科,以及中国对这些来华留学生的管理,都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数国增至二十余国,留学方式由单一趋向多样,所选学科由传统学科转向现代学科,留学管理由无序走向有序。在近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来华留学的各国学子,虽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他们的到来,不仅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也为今日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近代中国;来华留学生;留学教育

【作者简介】余子侠(1953-),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武汉 430079);王海凤(1991-),女,山西汾西人,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开封 475004)。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21.5.111~119

既往的近代留学教育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国人出国留学,对于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则着墨甚少。从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国人来华留学也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推进人类各种文化文明交流和融汇方面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先后有二十余国的学子来华留学。在这个中国社会及学校教育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缘此,本文拟就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留学方式、所入学校及所选学科等加以爬梳分析,试图呈现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历史演变的状貌及其特点。

一、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一种“先进态势”,故而周边国家因仰慕中华文化而派遣学子来华留学起步甚早。其源头最迟可上溯两汉时期。自汉至清,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活动屡有显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但外国学子的来华留学行为亦未完全间断。而且随着世界

格局的改变带来中外教育交流的变化,近代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在既往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从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变化可以粗略看到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变迁轨迹。

进入近代,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尽管中国传统教育已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然而周边国家尤其是“东方儒学文化圈”中的各邦,仍怀着朝拜“天朝上国”的心境,延续派遣学子来华学习中华文化的传统。当时的清王朝,依旧摆出“恩泽万邦”的姿态,来接收各国学子来华学习。这一时期的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仍然承袭着隋唐以降的传统留学模式。根据史料,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有琉球、日本、李氏朝鲜和俄罗斯4个国家派遣其学子来华留学。

近代最早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应是琉球。早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琉球国王即开始派遣学子来华留学。延至清朝,琉球与中国继续保持着教育交流,对于该国派遣学子来华留学,清朝史籍常有记叙。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琉球国即提出派遣4人来北京留学的请求。对此,《钦定国子监志》记

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②又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二，礼部致内务府咨文称，应琉球国中山王尚穆所请，允其遣派官生梁允治、郑孝德、蔡世昌、金型等4人前来，依照雍正二年(1724)该国官生郑秉哲、郑谦、蔡宏训等3人“入监读书之例”，将梁氏等人“交与国子监肄业”^③。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即1841年，琉球国再次派出向克秀、东国兴、阮宣诏、郑学楷4名官生来华学习。甚至在被日本侵吞的前十年，即1869年，该国仍向中国派来毛启祥、葛兆庆、林世功、林世忠4名官生，这也是琉球国向中国派遣的最后一批留学生^④。

日本派遣来华留学生，可追溯到隋朝大业四年(608)。该年九月，在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来隋使团(即“遣隋使”)动身来华之际，日本“加派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晏、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惠齐八人同行，入隋求学”^⑤。自此开启了日本学子来华留学的航路。在近代，仅就该国中央政府官派学子来华留学而言，根据日本史籍记载，最早发生在1871年。是年5月17日，日本派遣“鹿儿岛藩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戎平、佐贺藩成富忠藏、福岛礼助”5人来华留学。其后，日本还派遣水野淳造(名古屋藩)、黑冈勇之助(鹿儿岛藩)来华学习^⑥。这些学子可视为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的先驱。

朝鲜半岛^⑦学子来华求学，在隋唐时期亦多有所见。当时朝鲜半岛的“三国”(高丽、新罗、百济)，“均有选派学子来华留学的行动或举措”^⑧。及至清朝，李氏朝鲜亦选派学子来华留学。如顺治五年(1648)三月，李氏朝鲜派宋仁龙来华学习历法^⑨。鸦片战争后，光绪六年(1880)九月，李鸿章遵旨“筹议朝鲜武备”，准许李氏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等与朝鲜奏官卞元奎拟具来学章程奏闻”。次年(光绪七年)二月，李鸿章奏言：“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日赴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贡呈其国请示节略一本。”由是“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给空白凭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⑩。李鸿章的奏言仍然展现着大清“天朝上国”的气势。

俄罗斯派遣学子来华留学，在清康熙朝就已开

始。康熙年间，俄罗斯“尝遣人至中国学刺麻(喇嘛)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⑪。雍正年间，犹有俄罗斯学子来华：“雍正六年(1728)，鄂罗斯(俄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⑫此后直至清末，陆续有俄罗斯学子来华求学。在1901年，清政府为振兴中国传统儒学发布诏告称：“谨按《大清会典》，我朝准俄罗斯遣子弟赴国子监肄业；朝鲜陪臣入贡，亦得留学中华，以故四子五经流入东西洋，每有译作旁行斜上之文，饬遗彼中弟子者。”^⑬可见，直到清末实行“新政”发展新学之时，俄罗斯与朝鲜仍有学子得以准入国子监学习。不过，在“新政”教育变革之际，国子监被裁撤，俄罗斯转而开始奏请派遣学子入重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肄业^⑭。如在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七日，俄国公使廓索维慈致函清外务部，请求清学部准许“海参崴东方语言学堂肄业生索柏尼齐、阿尼西、柏罗诺夫、吕诺夫4名”，前往京师大学堂游览观光^⑮。此事经外务部转学部核办，在得到“可也”答复后不久，俄罗斯即正式派遣2名学生前来京师大学堂学习。及至中华民国成立时，俄罗斯所派的这2名学生仍在京师大学堂就读；阿理克入京师大学堂听讲经史课程，大学堂还为他单独开列了“经史课程表”；迪德生在学部的允许下“前往京师大学堂听讲中国历史”，大学堂还为他将“所有中国历史讲授时间另单开”，让他按照开具时间前来听讲^⑯。

晚清时期，清王朝对学校教育已作出了多次变革，自京师同文馆创办后陆续出现了一定数量及规模的新式学堂，但根据琉球、日本、李氏朝鲜、俄罗斯诸国学子来华留学的史料，当时各国学子来华学习，大多仍属于一种既往接纳外邦人士来华留学的“传统模式”。这些外国学子几乎是进入传统的教育机构，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且各国与清王朝之间，在学子的派遣和接纳方式上，依然遵循历代封建王朝的礼仪规范。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短时期内制订了各项教育政策，其中虽然包括留学政策，但从出台的各种官方文件来看，基本上是关于国人出国留学的政策法令，直到1916年9月才颁布了《大学分科外国

学生入学规程》，但该文件并未产生实际的成效。不过，在新式教育体系逐步确立的情况下，由于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对各高校管理较松，一些高校主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来招收外国学子入校就读。正因如此，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基本上处于一种由各高校自主招收的状态。如1924年，北洋大学制定的《外国留学生规程》即规定：“外国人愿来本校留学者，须于本校招生时，用中英两国文字开具请愿书，说明国籍、住址、最近亲属或后见人姓名、住址及本人在何处学校毕业，亲自报名并呈最近像片一张及最后毕业证书，听候核夺，俟核准后，随本国同受入学试验。”^⑦又如1924年3月，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李希贤“以韩人崔钟烈，恳入该校肄业”，“特定《外国籍学生留学规程》，呈请教育司核准”。该规程强调，经校长许可，外国籍学生应与本国学生受同等之待遇。其后，韩国学生崔钟烈按该规程要求呈经教育司核准，“得编入相当班次为旁听生”^⑧。

与上述两校相类同，各有关高等学府均自主制定外国学生来校留学规章，就连主要作为培养出国留学人才基地的清华大学也在1930年9月9日制定了《暂订外国学生肄业章程》。正因为各高校具备这种办学自主权，以及当时中国新式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明显增多，大致可分两类：一是中国周边国家，主要有日本、日殖朝鲜、印度、英属马来、暹罗等；二是欧美国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波兰、瑞士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土耳其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中外教育交流也受到极大的阻碍。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各大专院校或停办或西迁，来华留学教育陷入低谷。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为加强同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根据1947年2月出台的《教育部组织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国际间交换师生事项和国外留学生选派及指导事项的“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⑨，还专门订定了《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以利外国学子升入专科以上学校肄业。该办法的要点如下：（一）外国留学生，经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外国

际文化合作机关保送者，得由教育部分发肄业；（二）保送外国留学生，须于每学年开始前，开具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等项，连同毕业证书、肄业成绩单及照片送教育部核办，保送名额，由保送机关与教育部商定；（三）各校对教育部分发之外国留学生应从宽甄试，成绩及格者作为正式生，不及格者作为特别生，其中国文及国语程度较差者，由校设法补习；（四）各校对于国外留学生，应指定人员负责协助指导，注意其生活状况及学业情形，于学期终了时，分别列表呈报教育部备查^⑩。同时还出台了优待越南、暹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国来华留学生的《南洋学生奖学金办法》^⑪。由于这一系列的优待政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有多个国家的学子来华学习。这些来华留学生的国家可分为四类：一是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越南以及英属马来等；二是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等；三是美洲国家，包括美国、秘鲁等；四是大洋洲国家，主要为澳大利亚。

综合上述，近代遣送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及目前所见外国学子来华求学行动可以抽样列表（见表1）如下。

二、近代来华留学生的留学方式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更替、政体转换，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途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大致可区分为两类：一是官方派遣，二是自费来华。其中官方派遣是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最主要的途径，其方式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单向的各国政府选派学子来华；其二，双向的中外互派自己的留学生。自费来华留学，这种非由官方渠道而系个人或团体自费前来中国的留学途径，其方式也可分为两种：其一，个人因慕名中国某校或某系科，直接致函该校，并自备经费来华留学；其二，个人通过中国学界名人或教育团体的介绍而自费来华留学。

单向的各国政府选派学子来华的留学方式贯穿于整个近代社会。晚清时期，最具代表的即前文所述的琉球、日本派遣学子来华学习。民国时期，可以英、美两国选派学子来华留学为例。如1924年，中国科学社在讨论英美退还“庚子赔款”用途时言及：“在中国有名大学中设额若干，备英美人来华留学。”^⑫

表1

近代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例证一览表

国家	来华学子情形	备注
琉球	1841年向克秀、东国兴、阮宜诏、郑学楷入国子监学习	在华学习三年期满后,4名学生于1844年4月归国
日本	1871年鹿儿岛藩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戎平、佐贺藩成富忠藏、福岛礼助等来华学习	晚清时期日本第一批官派来华留学生
朝鲜半岛	1880年派学子入天津东、南两局学习	所学实为新式武备内容,如制造、操练等
俄罗斯	1909年阿理克等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入新式教育机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课程
法国	1909年3名学子拟入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学习 ^②	
土耳其	1928年赖毅夫来华学习	由大学院发给通晓华文证明书
丹麦	1929年斯密蒂(Gerd Smidt)入清华大学学习	该生毕业于巴黎东方学院
美国	1929年美国约翰霍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多名学生来华学习	
德国	1929年德国公使卜尔熙之子入清华大学肄业	该生为“外人入国立清华大学肄业之第一人”
波兰	1930年郭雷新斯基(Krysinski)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	该生为波兰公使署参议
瑞士	1932年Madame Parejas入中央大学旁听	该生为中央大学英语教授勃雷贾(Parejas)的夫人
英国	1933年窦女士(Miss Darroch)入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学习	
暹罗(泰国)	1933年1名学子入北京大学学习	1937年中暹协会成立后,暹罗有拟派学生来华留学之意,中国中暹协会理事长周启刚,为此特呈请政府对暹罗派遣来华学生,分大学、中学来规定学额,各予优待 ^③ 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教育问题
英属马来	1934年马来王子安哇尔(Anwar)入同济大学学习	该生毕业于荷兰高级中学
印度	1943年鼎尔、叶赫生、芮古默、钱菊本、叶夏克、狄克锡、沈苏美、余亚梅、许鲁嘉、甘尚澍等入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习	这10名印度留学生在进入中国高校之前,有的已获得学士学位,有的已获得硕士学位
秘鲁	1946年中秘有交换学生的计划	目前尚未见学生来华的具体资料
越南	1947年段德仁、郑功德、郑功成、武福悬、武德进、陈文鞏、阮绍先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学习	
意大利	1947年白道礼入中央大学文哲两系旁听	该生为翻译员
菲律宾	1947年4名官费生入厦门大学学习	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
澳大利亚	1948年中澳商讨交换学生或学者来华	

资料来源:根据近代《申报》、《中央日报》等资料整理而成。

其后,教育部总长蒋梦麟极力倡导外籍学生来中国就学。在中方的努力下,1930年,“美国已派定八人来华”,要求在中央大学入学或旁听,“现闻中央大学已复函表示欢迎,查现世界潮流,学说为公,万不可对外人有轻视之心”^⑤。1933年,英国也按照中英庚款协定派出窦女士(Miss Darroch)到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学习,并留心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研究^⑥。窦女士应是近代英国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留学之第一人^⑦。

双向的中外互派自己的留学生的留学方式,以德国为例。1934年,为加强中德文化沟通和教育交流,德国亨堡基金会拟派康达女士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及美术,请中国酌情给予补助费,亦请中国派遣一名大学生赴德研究科学,以资交换,“闻中国教育部,对此交换学生研究事,已允许照办”。双方还确定:“自本年七月份起,每月补助康德(达)小姐一百十元,以一年为限(大约在中央研究院研究),而中国指定在德研究生一人,亦同样受德国按月拨给补助费云。”^⑧

这可看作中德交换留学生之肇端。1935年,中德双方遂正式互派留学生:“德国学生三人,石克林、梅克们安梅者,今日起程赴中国,将肄业于北平之清华大学,盖实行中德两国大学学生互换肄业之办法也。德国第三学生,将于十二月间起程。同时清华学生三人,将于十月抵柏林。”^②此后,有关报刊对中德双方互派留学生多有报道。

自费来华留学中纯属个人自备经费者,晚清时期即已出现。当时外国学子来华求学主要是进入中国的传统书院学习,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光绪九年(1883),时任湖广总督涂宗瀛捐银5000两助开叠山书院。由于藏书丰富,加上书院主持人万清轩声誉甚隆,叠山书院闻名遐迩,“不仅省内外学者慕名而来,而且朝鲜北海(道)成均世儒徐相默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携弟子边尚玉谒见万清轩,并住书院受教30余日”^③。进入民国后,中国学校教育日有进步,亦有不少外国学子自费来华留学。如1929年,“丹麦女生斯密蒂(Gerd Smidt),曾在巴黎东方学院毕业,对于东方学问,欲加深造,拟于下学期亦来入该大学(指清华大学——引者注)”^④。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仍有外国学子自费来华学习。如1947年,“义大利(意大利)义籍翻译员白道礼君,对于中文研习有素,且感兴趣,现拟加入中央大学文哲两系旁听,以资深造”^⑤。

通过中国学界名人或教育团体介绍来华的留学方式,主要出现在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民国前中期政府并未出台具体来华留学政策,因而各国学子若想来华留学,大多需借助外力才能实现:或通过中国学界名人引介,或经由教育团体联络。前者可以土耳其学生赖毅夫来华留学为例。1928年,赖毅夫上呈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窃学生籍隶土耳其共和国,曾受大学教育,平时对于东方文化——特别的是中国文化——异常敬重……本年三月间,贵国政府委员胡汉民先生等驾临敝国,经学生拜谒面谈,胡君亲加考试,当承赐予证明书为证,并承孙科先生赐赠三民主义等书,以作纪念。惟学生将来拟来中国留学,甚欲先得贵院发予通晓华文证明书,以便恳邀敝国政府之照准,而为到抵中国时之一证据,庶可引起华人

之兴趣,而得相当之便利。因此谨将胡君给予之证明书连同寄上,敬恳俯鉴下情,予以照准,发给通晓华文证明书,至为盼祷。”^⑥其后,大学院发给赖毅夫通晓华文证明书,方便他前来中国留学。后者可以韩国学生宋休东来华留学为例。据当时《大公报》报道:韩国学生宋休东一向羡慕“湘中文化”,特于1924年9月18日前来湖南省教育会“要求介绍”入湖南省第一中学学习,“省教育会当即准如所请”,并“备文函知第一中学”。其函云:“迳启者,兹据韩国学生宋休东来会面称,学生仰慕贵国文化,欲入贵省第一中学求学,以资深造。恳贵会备函咨送等语。查吾湘省立学校,收录外国学生,已有第一女师范先例可援,事关推广教育,用特函达台端,敬希酌予收录为荷,此致第一中学校长。”^⑦有了湖南省教育会的介绍,该生顺利进入湖南第一中学就读。

三、近代来华留学生所入学校及所选学科

由于近代中国学校教育不断变革发展、开设的学科专业不断变易增添,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入学校及所选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清末实行“新政”之前,虽说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起始,陆续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维新变法时期还开办有新型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但直至20世纪之初,中国学校教育机构依然以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一书院一塾学为其体系主干,因此各国学子来华后,受限于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所入学校主要是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或各地书院:官费生一般肄业于国子监,自费生主要求学于传统书院。关于当时外国学子入中国书院学习的情形,不少史料有记载。如在张裕钊^⑧执教直隶莲池书院期间,有单独师事张氏者七人:崔栋、张殿士、刘若曾、宫岛彦、黎汝谦、齐令辰、宫岛诚一郎。其中两位宫岛氏即是来自日本的学生。

清末“新政”之前,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其中又以经学为重。1880年,《申报》上报道:“日本朝廷现拟派发其子弟来华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兹闻人数尚无定额,惟据该国日报所言,则令所派子弟在华时改服中华衣服,辫发皆从华俗,以取其便云。”^⑨直到1909年,清政府仍指出:“外

国人愿在中国经科大学留学一节,外间喧传已久,兹知学部蒙(指荣庆——引者注)尚书已于二十九日奏明经学一科为中国所独有,准外国人入学,由部臣酌定简章以期妥洽。奉旨允准。”^⑤是年5月,俄人阿理克来京师大学堂“听讲经史一月”,迪德生来“听讲中国历史”^⑥。

清末实行“新政”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旧式教育机构国子监与书院的裁撤,使得新式学堂得到了发展。但此时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机构,包括京师大学堂也不过三四所。外国学生来华也多半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如1910年10月,日本人佐藤知茶和菊川谦次郎分别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和文科肄业^⑦。中华民国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的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不断增加,来华留学生所入学校,主要集中在高校,有国立大学,也有私立大学。在国立大学中,不仅有综合性大学,还有专科学校。不过,其时外国学子所入学校主要以综合性国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或专科学校为辅。综合性国立大学,又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招收的外国学子较多。这一时期也有数所中学招收有外籍学生。据长沙《大公报》载,1917年,“日本仙台人村田殖孝(十六岁)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许否,事出前三月,范(源濂——引者注)总长即至该校校长互相研究是否允许,但基于中日亲善方针,此次考试如能及格,即

允其入预备科肄业。二十日提出正式保证书,日人之入中国中学者,将自村田君始云”^⑧。

讨论清末实行“新政”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一历史时段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有必要先了解当时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1912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以及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了大学学科的建制。《大学令》明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传统经学被取缔,附属于文科之中。然而,即使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发生了如此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仍是来华留学生求学的首选学科。如1936年,“东京日本学生……将来留学学校,以国立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三大学为限。肄业年限,限定三年,其第一批选定之留学生,将于明春来华,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及中国政治三者”^⑨。之所以仍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来华学习的首选,皆因当时有些国家,上至政府要员,下及民间人士,仍然有不少人仰慕中华传统文化。因此,无论是官费生,还是自费生,他们来华留学的动因,多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

不过,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仍为来华留学生学习的首选,但已开始逐渐有留学生选取或接受其他学科,诸如经济、法律、政治、教育、医学等。这从中山大学1928—1937年韩籍毕业生所选学科的情况可以得证(见表2)。

表2 1928—1937年中山大学韩籍毕业生所选学科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肄业院系	备注
金星淑	男	27	法科政治系	1928年6月毕业
金圭善	男	30	医科	1930年6月毕业
李贞浩	男	22	文学院中文系	1934年6月毕业
金贞淑	女	25	法学院经济系	1936年6月毕业
金昌华	男	25	文学院教育系	1937年6月毕业
徐尚虎	男	23	法学院法律系	1937年6月毕业
安炳武	男	26	法学院政治系	1937年6月毕业
宋冕秀	男	27	法学院经济系	1937年6月毕业
金德穆	男	25	法学院经济系	1937年6月毕业
金铉	男	24	法学院经济系	1937年6月毕业
金孝淑	女	24	法学院经济系	1937年6月毕业

资料来源:《全国私立各院校呈报韩籍员生调查表及有关文书》,1931年7月至1943年4月,全宗号5,案卷号20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中国高等院校大规模迁徙“大后方”。在此特殊的时期,外国学子来华所入学校,不仅有综合性大学、私立大学,还有国立中学。来华留学生所入综合性大学,以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为主;私立大学,主要有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其时进入私立大学的外国学子,一般主要是各国的贵族子弟。如1943年,“新任印驻华专员梅浓将来渝,其长女公子,拟入成都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此乃印度女学生入中国大学之第一人”^④。此外,与之前相比,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中学招收的外籍学子逐渐增多。如在1946年,仅国立第九中学就有外籍生李中西等38人,欲随该校皖籍学子一道复员前往安徽就读^⑤。

综合而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选学科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则以现代科学为主,涵盖了文、理、工、农、法、医等学科。这从1943年中央大学韩籍生所选的学科可以得见(见表3)。

四、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点

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育领域,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几经变换,逐渐实现由传统学校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近代来华留学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

第一,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数国增至二十余国。在晚清时期,来华留学的外国学子主要来自中国的周边国家,即琉球、日本、朝鲜和俄罗斯4国。这种仅仅数国学子来华留学的状况延续了近

半个世纪。

当被纳入新的世界体系后,中国不仅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而且派遣学子走出国门,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中国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加之,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逐渐注重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往,主动邀请各国学子来华留学。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据时人称:“教育部长蒋梦麟,已多方设法,容纳外籍学生来我国就学。一切由部妥定办法,学费从廉,以示优待。拟先设立于上海,俾外来学子,均先安顿。又闻外交部长王正廷,已将此事转达外邦各国,庶多提倡,以遂学术与宗教之志愿。因科学制造为各国之绝艺,而于道德一术,为我中国开化最早。列古治世之平天下,皆从道德而来,不行则乱。今外人觉悟而更求道德,非至我中国不可。相(想)见必鱼贯而来,不绝于途也。”^⑥虽说蒋氏的设想并未及时形成政策文件,但已显示出国人对于接受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积极态度。

民国时期,世界各国对派出学子来华求学的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如当时报刊所载:“近来世界各大学,多有慕吾国文化之名,派遣学生来华留学之计划。”^⑦对此可以美国为例,1930年,“胡佛总统深明立国非道德,不足以治世而平天下。如英法诸国,亦有鉴于频年天灾人祸,人民死亡不可以数计,皆不明道德之故。所以亦相继使青年子弟来我国学习华文,以明道德之至理”^⑧。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既往的4国增至20余国(且此时琉球已被日本吞并)。就其地域的分布来看,除了亚洲地区,欧洲、美洲乃至大洋洲,都有国家开启派出学子来华留学的航道。

表3

1943年中央大学韩籍生所选学科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现肄业院系、年级	原毕业学校
金维	男	32	文学院外文系二年级	安岳安新学校
马超群	男	30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咸北会宁公立商业学校
陈春浩	男	27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汉城中央中学
金仁	男	24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平壤崇实中学
王中元	男	28	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	平壤中学
赵桂林	女	20	医学院医本科一年级	教育部特设第五中山中学班
文靖珍	男	27	文学院外文系二年级	广州仲元中学

资料来源:《全国私立各院校呈报韩籍员生调查表及有关文书》。

第二,来华留学生的留学方式由单一趋向多样。近代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官方派遣与自费来华。但这两种方式在晚清与民国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晚清时期,官方派遣主要是单向的各国政府向中国派遣学子。民国时期的官方派遣,不仅有单向的各国学子来华留学,还包括双向的中外互派留学生。而中外互派留学生,不仅是双方政府派遣,还有各国文化协会与中国高校双方的派遣。中外互派留学生属于教育领域的一种双向交流,此种来华留学方式的出现,说明在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过程中,中国开始极力求取这种交流的平等地位。

自费来华留学的方式,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主要是各国学子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不通过官方渠道而自来华学习。中华民国成立后,外国学生自费来华的方式开始多样化,即除个人自行来华留学外,各国学子来华大多或通过中国学界名人引荐,或经由有关教育团体介绍。这种来华留学方式上的变化表明,进入民国后,在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活动已成为维系中外友好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如1934年马来王子安哇尔(Anwar)来华留学即是最好的说明:“南洋荷属东印度,西里伯斯岛(Celebes)望加锡(Macassar)土王巽他氏(Sonda)之子安哇尔(Anwar),曾毕业于荷兰高级中学,近以巽他氏素仰我国民俗朴厚、文化发达,又慕国立同济大学办理完善,举世知名,因托我国驻锡领事王德菜氏,介绍来华,会晤(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氏代为安置,现安哇尔已于十月一日抵沪,先由中南文化学会理事刘士木、黄索封二君陪往市教育局谒见潘局长,当由潘氏派专员周尚办理此事。”^[9]由此可见,马来王子经我国驻锡领事介绍来华,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综上可见,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方式既有官方派遣又有自费来华,显示出外国学子在来华留学方式的选择上由单一趋向多样。

第三,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由传统学科转向现代学科。从晚清时期到民国时期,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尤其是近代大学学科的设置,不断演变与完

善。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大学学科建制中,以“四部之学”为主的中国传统经学,逐步转型为鉴取西方学校教育的学科体系建构。随着中国学科体系的发展,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选学科,也开始由传统经学转向现代科学。

中华民国成立前,甚至是在民国元年,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选学科主要以传统经学为主。相关资料显示:1912年9月,日本人浅井周治入读北京大学,被编入大学文科经学门,随班上课,至民国二年(1913)4月毕业,浅井周治“续请留学五个月”,得到校方的同意^[10]。1913年10月,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大学令》的颁布,经学归入文科,其独立学科地位被取消。自此,中国传统经学地位急剧下降,西方的现代学科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各国先进学科知识的引入,中国的近代大学也逐步构建起以西学为基础的大学学科体系。与之相应,各国学子来华后,在学科的选择上逐步转向现代科学。如前文表3所示,1943年在中央大学留学的7名韩籍学子,分别求学于文、法、医、工等系科或专业。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宏观层面而言,经过民国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西方现代科学被带入国内后逐步融入课堂且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于微观层面论之,经过民国以来尤其是数次学制变革的学科调整,中国各大高校的学科建制已渐趋完善。与既往相比,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选学科自然开始走向多样化。

第四,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由无序走向有序。晚清时期尽管已开启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行程,但为寻求教育领域的变革,国人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出国留学教育,清政府对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未能出台任何规章。

民国前期,关于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政府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加以规范。甚至到1930年,当时的《申报》仍报道:“波兰公使署参议郭雷新斯基(Krysinski)前在巴黎留学时,与上海法政学院朱佛定教务长同班肄业,同得博士学位,此次来华,订立中波条约,闻上海法政学院课程完备,教授多系知名之士,故特要求郑毓秀院长,准其在该院肄业,现在中波条约已告成功,郭氏特于日昨由京来沪,赴该院报

到注册。”^④由此可以看出,郭雷新斯基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并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的程序,而是只需院长许可,即可入校学习。故而可以说,其时的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而是处于一种分散、无序的状态。

直至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设置相关机构和公布相关文件,对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有序的管理。其一,专门设置了包括管理来华留学事务的机构“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并为外国学生设置了奖学金;其二,明确规定了正规渠道来华的留学生由教育部“分发”各相关学校肄业,使来华留学生归属中央统一管理^⑤;其三,正式强调了来华留学生应参加各校入学考试,根据“甄试”结果分为正式生与特别生,各校于特别生应“设法另予补习”,以利其顺利留学,^⑥。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对待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是从起初清政府以“恩泽万邦”的高姿态,被动接收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到民国时期以“学习西方”的低姿态,主动邀请各国学子来华学习。在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此种态度的转变,为后来中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式。在历史长河中,尽管近代来华留学的人数较少,然则宛如山泉涓流,使得自古以来的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事业得以延续。而来华留学的这些外国学子,有效地架起了沟通中外教育交流的友好桥梁,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和教育交流史上,书写了不应为后人忽视的一笔。

注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民国景金陵原刊本。

②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上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嘉庆朝(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7-88页。

④参见徐恭生:《琉球国在华留学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⑤沈云龙:《隋唐时代日本派遣来华的留学生》,《国论》1935年第1卷第2期。

⑥谭皓:《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⑦今日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在近代先称为“李氏朝鲜”,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欲独吞朝鲜半岛遂大举入侵,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自后至1910年即称为“韩国”。1910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为日本侵占,李氏朝鲜遂亡。然半岛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抗日不止,这些独立人士于1919年4月11日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45年半岛北部获得解放,自半岛一分为二:在北纬38度线以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9月9日成立;以南为大韩民国,于1948年8月15日成立。

⑧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⑨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IV),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1290页。

⑩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26,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96页。

⑪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定俄人来京就学额数》卷三,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刻本。

⑫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6,第3108页。

⑬《观张广文请就南洋振兴孔教稟牍推广言之》,《申报》1901年10月19日,第1版。

⑭1900年,京师大学堂先后遭到义和团、八国联军的冲击,被占为兵营而被迫停办,1902年战事平息后才恢复办学。

⑮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⑯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354-355页。

⑰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⑱《教育司优待韩国生办法》,《大公报》(长沙)1924年3月23日,第7版。

⑲参见《教育部组织法》,《教育通讯》(汉口)1947年复刊第3卷第4期。

⑳《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9卷第5期。

㉑《南洋学生奖学金办法》,《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9卷第4期。

②法国3名学子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传统经学一事,据《教育杂志》1909年第1卷第11期《记事·外人求入经科大学》,其时有英、法、美、日等国拟派学子(其中法国3名)来华入京师大学堂就读,但此事涉及国际外交,双方反复磋商,后因朝政混乱、政权更替,此议并未落实。

③《暹罗学生将来华留学》,《边疆》1937年第2卷第12期。

④《中国科学社对英美退还赔款用途之宣言》,《申报》1924年8月12日,第15版。

⑤《美派学子八人来华留学,要求中央大学准入学或旁听》,《山东教育行政周报》1930年第90期。

⑥《英国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首派宴女士到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4卷第21期。

⑦宴女士幼年生长在中国,回英国后,在爱丁堡大学专攻教育,毕业后先后为中小学教员,曾为伦敦帝国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⑧《中德为沟通文化交换研究生》,《申报》1934年9月2日,第19版。

⑨《中德实行学生互换肄业》,《申报》1935年9月25日,第13版。

⑩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教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页。万清轩,即万斛泉(1808-1904),湖北兴国(今阳新)人。曾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在太尉山结茅受徒,授以《小学》、《近思录》、《朱子大全》。晚年回归故里,于光绪六年(1880)任兴国州叠山书院院长。1882年,湖广总督涂宗瀛以其“恪守程朱之学,躬行实践,老而弥笃”奏闻于朝,加国子博士衔。因其毕生穷究程朱之学,被学界称为“万理学先生”。

⑪《清华大学近讯》,《中央日报》1929年7月30日,第1版。

⑫《外国来华学生登记簿及有关函件》,1947年1-2月,全宗号5,案卷号151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⑬《土耳其学生赖毅夫来呈 为呈请给予通晓华文证书以便来华留学由》,《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卷第8期。

⑭《韩国学生来湘就学》,《大公报》(长沙)1924年9月19日,第7版。

⑮张裕钊(1823-1894),湖北武昌人,与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并称“曾(国藩)门四弟子”。先后在武昌勾庭书院、金陵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等地执教,任讲席、山长等职。据载,张氏执教莲池书院始自1883年(参见叶贤恩:《张裕钊传》,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⑯《日肄华文》,《申报》1880年4月3日,第2版。

⑰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⑱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⑲参见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2册,第91页。

⑳《日人有留学我国者》,《大公报》(长沙)1917年8月29日,第2版。

㉑《日本将于明春派学生来华留学》,《进修半月刊》1936年第6卷第2-3期。

㉒《梅浓之女拟来华留学》,《教育通讯》(汉口)1943年第6卷第26期。

㉓参见《外国来华学生登记簿及有关函件》。

㉔可翁:《外籍学生将来华留学》,《大常识三日刊》1930年5月10日,第3版。

㉕《欧美大学生来华留学》,《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0年第35期。

㉖可翁:《外籍学生将来华留学》。

㉗《马来王子来华留学》,《海外月刊》1934年第25期。

㉘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062册,第91-92页。

㉙《法政学院之外国留学生》,《申报》1930年3月12日,第11版。

㉚参见《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

㉛参见《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根据该办法,由教育部分发各校的外国留学生通过甄试分为正式生和特别生——“成绩及格者作为正式生,不及格者作为特别生”。